

文化安全研究的出场及核心概念的建构

刘 颖

【摘 要】“文化安全研究”是在一定语境下出场的。这一研究是中国知识界对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地区军事、物质扩张直接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的回应;是对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外部挑战、冲击,以及自身发展存在的诸多困境的因应;是国家安全研究这一学术探讨深化的结果。学界既立足国家这一主体、立足文化,也从“安全”属性的角度建构文化安全这一核心概念及其内涵。从文化安全研究的出场及其核心概念的建构看,这一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在吸收国外学术成果基础上的自主探索。

【关 键 词】文化安全研究;出场;核心概念

【作者简介】刘颖,女,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学(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宁夏社会科学》(银川),2023.3.56~63

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文化安全研究,“文化安全”这一学术话语是在一定语境下出场的。所谓语境,就是话语产生时的环境。通过考察文化安全研究出场的相关语境及其核心概念的建构,能够进一步认识这一研究产生的深层次学术机理以及与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内在学术关系,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化安全研究话语的出场

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研究是对近代以来世界及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文化问题的反映。理解文化安全研究的出场,应将其置于近现代世界及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同时,国内学界的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也是立足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发展的特定现实语境中的,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一)文化安全研究登场的历史与现实语境

第一,文化安全研究登场的历史语境。所谓历史文化语境就是一种学术话语在学术领域内生成时所蕴含的历史背景。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研究是近代以来世界和中国发展进程中文化问题的反映。

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并建立起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非西方国家文化受到直接冲击,客观上造成了非西方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这就是文化安全研究最初的历史语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276}

如果说近代西方对非西方的军事、物质扩张直接引发了相关地区的文化安全焦虑,客观上导致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那么,伴随这一过程,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意识中,还造就了西方文化就是他们文化应该发展的方向的认识。在西方侵略、扩张的过程中,文化安全意识开始逐渐在非西方国家、地区觉醒,从而建构了文化安全研究的关键历史语境。因此,有国内学者在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产生时,都强调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现实问题,是世界历史发到了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之后,特别是在西方列强对非西方国家、地区实行殖民扩张、实现殖民侵略政策,东西方文明冲突日益

激烈的情况下,才真正出现的^{[2][45]}。

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就是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缩影。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对中国军事扩张、物质扩张的加剧,西方文化也对中国构成了直接冲击,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于是,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何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各种反应力图解答的问题。这些探索也构成了中国学者探讨文化安全问题的直接历史语境。也就是说,中国学者探讨文化安全问题的直接历史起因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因此,有学者认为,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鸦片战争后,国力衰微,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文化被边缘化,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国家安全意识由此产生并日趋增强。“近代以来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对立,却明显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国家文化安全意识,国人开始着手探索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实践。”^[3]

第二,文化安全研究出场的现实语境。所谓现实语境就是一种学术研究话语形成时所处的现实环境。任何一种理论、一种研究,都是对现实问题的反映,也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国内学界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是立足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发展的特定现实语境的,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

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深度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一大显著特点,全球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并身处其中的客观环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还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并形成了诸多新的文化问题。作为对新的文化问题的回应,中国学界提出并探讨文化安全问题时,就打上了全球化的现实烙印。全球化成为中国学界提出和探讨文化安全问题的首要现实语境。1998年,有学者强调,全球化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全球化必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这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就成为东西方文化研究者们的一大热门话题^[4]。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网络技术开始在全球普及,对于中国而言,网络技术为文化发展变化提供了全

新的渠道,也为一系列新的文化问题的产生提供了机会:西方国家利用其在网络技术方面的明显优势,以网络为手段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不良文化、错误思潮借助网络产生了较大影响等。互联网加速普及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成为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出场的一个现实语境。网络带来的文化冲击引起学界关注。2001年以来,中国知网中探讨网络文化安全的各类文章达到230余篇,探讨网络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各类文章更是达到近600篇。

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中国文化发展不仅面临着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和冲击,中国文化自身发展也有诸多困境。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进文化扩张的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对中国意识形态进行了直接冲击。因此,来自外部因素引发的中国文化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在这种现实语境下,作为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学界开始兴起文化安全问题研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学界文化安全研究伊始,学者们就将文化安全问题归因于西方国家文化的扩张。1999年,朱传荣就将“西方国家文化渗透和扩张”作为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第一位的威胁与挑战^[5]。2000年,欧阳任国则明确提出,在“全球化”成为国际潮流的背景下,“文化侵略”、“文化渗透”正在逐步成为西方国家侵略其他非西方国家的主要手段^[6]。此后,中国学界基本形成了共识,即西方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等是造成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面也面临着困境,主要体现在多元社会思潮带来了新挑战,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矛盾境地等。来自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学者面临的又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从本质上讲,探讨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探讨如何发展中国文化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如何处理外来文化,而且涉及如何应对自身文化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因此,随着国内学术界开启文化安全问题研究,作为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关怀,中国学者不可避免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境遇予以反映,中国文化自身发展中存在诸如多元思潮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境遇等问题,都直接引发了文化安全研究。

(二) 国家安全研究话语主题下文化安全研究话语的正式出场

一种学术话语,是在一定学术话语体系下产生的,是对相关学术研究深化发展的结果。文化安全研究是随着国家安全研究的发展而出现的,是国家安全这一话语主题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

第一,早期国家安全研究话语体系中,开始出现文化安全的因素。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及其研究的概念,但是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涉及相关内容和相关领域。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但是,其“数量十分有限”^{[7]155}。这一时期,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美国等国家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等的介绍,另一方面,学界也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国家安全问题。在早期国家安全这一话语体系中,学界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安全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将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内容之中,但在开始关于国家安全的探讨时,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也存在文化安全的问题。

1989年,金应忠的《我国国家安全概念与现实》一文,开始探讨国家安全的含义^[8]。文章认为,影响国家安全既有有形的因素,也有无形的因素。武装入侵、军事封锁、禁运、间谍派遣、暗杀爆炸以及对政府的控制和干涉、直接颠覆活动等,都是有形的,“而无形因素则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具有渐进和逐步演变的特征”,但是,对于哪些是无形的因素,作者并没有展开分析。文章借用美国学者关于影响国家文化安全的无形因素的论述,表达了无形因素主要是指“思想”。可见,从作者关于无形因素的论述看,文化显然是属于这一类的。1992年,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中对国家安全进行了界定^{[9]395-396}。作者将国家安全界定为一种战略态势,即一国面对各类现实或潜在的、可能会给国家重大利益造成影响、破坏的威胁时,达到维护和获取国家重大利益这一目的时所处的战略态势。“只有给国家重大利益造成影响、破坏的因素,才会危及国家安全,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作者也提出了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

主要有经济战、外交战、心理战(宣传战)、科技战、生态环境战、恐怖主义活动、动乱、灾害、间谍战等“类战争”。可见,在早期国家安全研究话语体系中,文化实际是被当作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因素。

第二,随着国家安全研究的推进,文化开始被纳入国家安全内容之中。随着国家安全研究的推进,学界对于国家安全的内容以及文化在其中的地位等方面的认识也在深化。1993年,方敏的《论国家安全》一文比较早地探讨了国家安全的内容^[10]。作者认为,现代国家安全的内容非常复杂也更加深刻。现代国家安全的内容既包括国家领土不受侵犯和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等内容,也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甚至是民众心理等方面不受外来侵犯的内容。该文已经将思想文化纳入现代国家安全的内容之中。1995年,李少军的《国家安全理论初探》也探讨了国家安全概念内涵以及有关国家维护安全等。他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作者还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意识到只注意从军事层面理解安全已远远不够了,安全概念需要进行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内涵由传统的政治军事层面扩展到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安全,以及涉及全球的生态安全等问题。作者在阐述社会安全时,明确将保存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确保社会的顺利发展、确保政治的和社会的自治等一起归入社会安全的内容之中。作者还强调指出,维护一定社会的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是维护社会安全的内容之一^[11]。1999年,围绕国家安全这一主题,学界明确将文化安全界定为国家安全的内容之一。刘跃进在探讨“国家安全学”这一问题时提出,国家安全的内容包括国家的主权、首脑、外事、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资源、领土、种族、国民等各个方面^[12]。同年,桑松森在刘跃进界定的基础上,补充了科技、民族等国家安全的内容,但是删除了刘跃进提出的外事、种族等内容。桑松森认为,国家安全是对国家生存、利益和发展的保障,并进一步从国家独立和主权、领土不受侵犯,保证现行国家制度、经济制度安全不受破坏、民族文化安全不受侵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受威胁、民族和睦、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方面界定了国家安全的内涵^[13]。

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在国家安全研究话语体系中,学界已经逐步明确将文化视为国家安全的内容之一。在国家安全这一话语体系中,从被定性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转变为国家安全内容之一,一方面说明学界对国家安全认识、研究的逐步深化,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界深化了对文化在国家安全中重要意义的认知。作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显然是外化于国家安全这一体系的,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文化是不可能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对象来进行研究的。但是,当文化被纳入国家安全的内容之中后,文化就由一个外在的因素,转变为国家安全内容的组成部分。这样,独立提出文化安全这一话语,并形成以文化安全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话语就成为必然了。

第三,围绕“国家安全”这一主题,文化安全研究正式独立出场。1999年,多篇论述文化安全的专题论文公开发表。胡联合等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简论》中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安全所造成的冲击,文章正式提出国家文化安全这一概念,将文化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后产生的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领域内,并分析了文化安全问题是产生于无形状态的^[14]。文章认为,在当今世界,一国文化有可能在无形中遭到另一种文化的侵蚀、同化,并最终慢慢消亡;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这一国家文化核心的解体与消亡,往往是在和平共处的状态下逐步发生的,是无形的,大多是复杂的隐蔽战线的斗争结果。

同年,林宏宇的《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发表。该文系国内学界比较早的专门论述文化安全的论文。文章首先提出国家安全的内涵包括主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生态、领土、科技等,进而强调,在国家安全研究中,文化安全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文章还从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文化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意义。林宏宇认为,在维护国家安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而文化的作用则是对人产生影响,所以文化能够对国家安全产生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最深刻的。在此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文化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文化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15]

朱传荣的《试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

略》同样也强调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具体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作用。强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国家安全度;国际层面的文化交流能够为国家创造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该文还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对文化安全进行了界定,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主权国家能够保持本国文化性质,能够发挥本国文化功能,能够保证自身文化利益不受威胁、不受侵犯的能力与状态。文章还提出,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安全。从国家主权角度界定文化安全,以及关于文化安全的核心等都成为此后文化安全研究领域的重要观点。文章还分析了世纪之交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威胁、挑战:外部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文化渗透、扩张;内部则是中国文化建设自身面临着的困境。此外,文章还提出,从文化安全目标、文化安全机制、文化安全意识等方面,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的路径。^[15]

可见,学界对国家安全这一主题的探讨,经历了从探讨有形安全到探讨无形安全的认知过程,从忽视文化到把文化视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在因素,再到把文化与政治、军事、经济等一起归结为国家安全的内容,并正式提出文化安全这一概念的过程。这样,国内学界通过深化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探讨,“文化安全”这一学术话语开始正式出场。

二、文化安全研究核心概念的建构

概念是构成思想理论的基本单元,提出、界定和研究核心概念,一方面直接决定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同时也直接影响学者开展相关研究的视角、方法、理论的选取等。随着文化安全研究的正式出场,提出并建构文化安全研究的核心概念就成为学术研究的逻辑必然。学界对于“文化安全”这一研究的核心概念的建构,也是源自国家安全研究的。

(一)立足国家这一主体,建构文化安全的内涵

文化安全研究出场以来,不少学者都将文化安全等同于国家文化安全,主要从国家和国家主权这个角度来建构文化安全的内容,以及如何维护文化安全的。学界提出文化安全这一概念,体现了对国家特别是国家主权层面的关怀。研究者注重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探讨与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的含义。

2000年,胡惠林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政策系统。针对我国现实政策选择,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确定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文化发展战略,是我们的首要选择^[16]。同年,欧阳任国则聚焦国家这一主体,界定了国家文化安全。欧阳任国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一国面对他国对本国文化进行渗透与控制的时候,能够保障本国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的安全。因此,与国家文化安全相对的就是“文化渗透”“文化控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本质上就是“反渗透”与“反控制”^[16]。欧阳任国的界定,是立足于国家这一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探讨何谓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这个思路与朱传荣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后,随着对西方国家在现实中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扩张行为的认识,学界开始从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反对文化霸权的角度界定文化安全。2001年,王公龙提出,文化安全是一国针对别国采取文化霸权方式对本国的文化生活所进行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和反控制等各种举措,以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与延续性^[17]。2003年,胡惠林明确从国家主权角度界定了文化安全,就国家主权意义而言,国家文化安全包括国家的文化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文化传统及其文化发展的选择权等必须得到尊重等。具体内容有:国家的文化立法权、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权,以及文化传播、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立自主权,等等。在此基础上,胡惠林还提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涵,即国家文化主权得到保障,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捍卫^[18]。

有学者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文化安全区分。广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内的文化安全”,即国家范围内主要文化要素的安全。文化要素包括主权国家的意识形态、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狭义上的国家文化安全就是“国家文化的安全”,即主权国家层面的文化要素免于受到来自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和扭曲等。其中,主权国家层面的文化要素包括价值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形象等^[19]。还有学者提出从民族国家的两个不同方向界定文化安全。就外

部层面而言,是指一国文化不受外部威胁,拥有独立自主传承、发展本国文化传统的权力,拥有自由选择适合本国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的权力;就内部层面而言,文化安全体现在国家文化内部的传承与发展没有隐患,具体包括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安全。其中,民族传统文化安全包括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则是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政法思想、道德准则等方面的安全^[3]。文化安全类型的划分,反映了学者对于国家层面文化所涵盖内容的不同理解,这类界定的关键之处,还在于其立足于“国家”这一主体。

(二)立足文化,界定、建构文化安全的内涵

随着学界对文化安全问题探讨的深化,人们开始意识到不仅要立足“国家”这个角度来探讨文化安全,还要从“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文化安全”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的安全。因此,从文化的角度界定、建构文化安全的认知开始出场。2000年,傅莲提出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化安全。傅莲首先探讨了文化的含义,认为文化的定义存在含混的状况。对文化的不同定义,恰恰反映了文化本身的差异,而文化误解往往又是因文化的差异与文化隔阂导致的。在此基础上,傅莲认为,文化安全就是民族文化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具体指一国在文化精神领域的安全,即能够保持本国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够保持本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民族性和独特性^[20]。可以看出,傅莲虽然还是围绕“国家”这一基本主体展开,但是,她提出了一个从文化本身角度理解文化安全的问题,特别是强调了“文化的差异与文化隔阂导致文化误解”,显然已经将探讨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转向了文化自身。这一转向,有助于推动人们在认识文化安全问题时,突破“国家”这一单一主体,进而扩大了对文化安全内涵的认知。李金齐立足于将文化的核心界定为人类的价值体系,建构了文化安全的内涵:理解、承认、尊重、保护文化主体的生存方式、生存权利和改造世界的独有方式及其文化成果;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合法生存和合理发展等^[21]。

“文化安全”的界定实现了向“文化”本身转向,对于由概念而深化文化安全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突破了“国家”这一主体,实现探讨文化安

全主体多元化。二是人们注意到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不仅存在于弱势国家方面,也存在于其他国家。2001年,傅连提出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即在开放的过程中,本国文化受到了来自本国文化的糟粕和其他文化的不良影响。在此基础上,傅连提出,西方文化在全球化中同样也存在不安全的问题^[21]。这对于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采取的各种文化扩张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对探讨中国文化今后发展,特别是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三)从“安全”属性的角度,提出、建构文化安全

作为一个复合词的“文化安全”,既包括“文化”这一概念,也包含“安全”这一概念。因此,国内学界在提出并建构“文化安全”这一核心概念时,不仅延续着由“国家安全”话语中“国家”这一主体,来探讨“谁”的“什么”安全这一思路,而且同时也延续了“国家安全”话语中关于“安全”这一话语的界定思路,探讨何为“安全”?由此,学界从三个角度建构了“文化安全”这一概念。

一是从客观的角度建构文化“安全”概念。国外国家安全研究较早地从客观状态角度界定了“安全”,认为,安全是国家保卫其自身或其内部价值不受外部威胁、攻击、侵略、征服、毁灭等的一种客观的能力^{[23][40]}。建立在对安全客观性的理解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强调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刘跃进提出:“安全的基本属性应是主体不存在危险的一种客观状态,这种状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4]从安全的客观性角度建构文化安全,刘跃进提出:“文化安全的本质是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而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21]这一观点影响了很多研究者。在后续的研究中,有许多研究者都认定了文化安全的客观状态。有学者提出,文化安全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包括文化主权和文化实力的安全,以及文化沟通与社会整合^[25]。有学者认为,文化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保持文化不受侵犯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采取各种手段,最终建构的本国的文化安全状态^[26]。

二是从主观安全感角度,建构文化“安全”概念。诺曼·帕德福德(Norman J. Padelford)等人较早地

从主观的维度界定安全的内涵,认为,安全是对本国能否威慑、抵御来自外部的攻击,从而保持本国处于没有风险状态的感觉。这种感觉涉及对本国实力、对盟国和敌国实力、意图,以及对当前国际形势的信心等^{[27][180]}。从主观方面界定安全,为文化安全研究建构文化安全概念提供了重要基础。国内有学者也侧重从主观感受角度提出和建构文化安全概念。潘一禾明确提出,文化安全是一种安全感,即在全球化大势下,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基本价值”、“文化特性”不会逐渐消失或退化的安全感^{[28][28]}。文化安全具体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传统文化和独特价值体系、民族语言和信息传播、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素质等方面的安全感^[29]。有研究者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安全是指民族国家对自己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文化遗产等免受他国文化侵蚀,并因拥有自身特定的文化身份和特征而获得的“安全感”^[30]。可见,这种界定的关键之处在于将“文化安全”定义为主体对于自身文化处于安全状态的体验、感知及满足。

三是立足主客观的统一来建构文化“安全”概念。阿诺德·沃尔弗斯(Arold Wolfers)指出,从客观上讲,“安全是自己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从主观上讲,“安全是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会受到攻击的恐惧”^{[31][28]}。这是从主客观统一的角度对安全进行的界定。巴里·布赞提出,“安全是客观和主观的结合”“某些问题被认为是安全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真正存在客观威胁,而且还因为那些问题在主观上被当做一种威胁而提了出来”^{[32][32]}。沃尔弗斯的观点直接被国内学者吸收。国内有学者将沃尔弗斯的观点总结为:安全就是在客观上不存在威胁情况,主观上不存在恐惧感^[33]。

在关于国家安全研究从主客观统一的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文化安全研究也承袭了这一思路。有学者提出,从客观的角度看,国家文化安全包括:本国文化没有受到外部威胁,拥有独立自主传承、发展本国文化传统的权力,可以自由、自主选择本国意识形态、文化制度的权力,本国文化内部的传承、发展没有隐患。从主观上讲,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主观感受,即本国民众对本国家、本民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信心,没有对本国文化及价值

系统有可能受到威胁、袭扰、攻击的忧虑和恐惧^[1]。

可见,建立在国家安全研究对于“国家”、“安全”等理解的基础上,文化安全研究已经建构了文化安全概念及其内涵。此外,建立在对“文化”的理解基础上,文化安全研究也建构了文化安全概念及其内涵。

三、结语

从文化安全研究的出场及其核心概念的建构来看,这一研究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首先,文化安全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对中外相关研究的继承和发扬。如前所述,中国学界在建构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时,特别是在探讨“安全”这一概念时,既承袭了国外学界关于这一概念建构的三种角度,也立足中国文化安全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化安全的理解。同时,文化安全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建构,体现了中国学界对国内国家安全研究语境的继承。其次,文化安全研究体现了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自主探索的深化。文化安全研究最初是学界从国家安全研究话语中延伸出来的,学界主要是立足于“国家”这一主体探讨的。随着学界探索的深化,学者们开始转向“文化”这一主体,探索文化安全的内涵。这一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说明文化安全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随着中国的发展,文化安全的内涵必将不断扩展,将由被动防卫转向主动发展。这也体现了近年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以及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趋向。

综上所述,文化安全研究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努力和成果。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建构文化安全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依然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 [3]程伟.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生成与演化[J].河南社会科学,2019(1).
- [4]王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J].天津社会科学,1998(3).
- [5]朱传荣.试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J].江南社会学院学报,1999(1).

- [6]欧阳任国.注重国家文化安全问题[J].内部文稿,2000(3).
- [7]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国家安全学科的探索历程及若干问题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
- [8]金应忠.我国国家安全概念与现实[J].国际展望,1989(22).
- [9]赵英.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 [10]方敏.论国家安全[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3(Z1).
- [11]李少军.国家安全理论初探[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12).
- [12]刘跃进.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J].国家安全通讯,1999(1).
- [13]桑松森.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学[J].国家安全通讯,1999(2).
- [14]胡联合,胡铭.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简论[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 [15]林宏宇.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J].国家安全通讯,1999(8).
- [16]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策略[J].学术月刊,2000(2).
- [17]王公龙.文化主权与文化安全[J].探索与争鸣,2001(9).
- [18]胡惠林.在积极的发展中保障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J].美术,2003(2).
- [19]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 [20]傅莲.论文化安全[J].国际政治研究,2000(4).
- [21]李金齐.文化安全: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现实问题[J].思想战线,2006(1).
- [22]傅莲.略论文化安全[J].理论视野,2001(1).
- [23]SHILLS 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Vol. 11[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68. Robert J. A. Defense: Amé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J]. Vol. 15, No. 41991.
- [24]刘跃进.从哲学层次上研究安全[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3).
- [25]戴晓东.文化安全的三个辩证关系[J].社会科学,2011(8).
- [26]郭新伟.论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及其特点[J].商业时代,2012(4).
- [27]LINCOLN. N. P. G.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1962.
- [28]潘一禾.文化安全[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 [29]潘一禾.国家文化安全的“非传统”研究[J].文化艺术研究,2011(2).
- [30]吴瑛.论文化安全的困境:起点与终点的悖离[J].国际新闻界,2009(5).
- [31]WOLFERS A.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62.
- [32]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M].朱宁,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33]李少军.论安全理论的基本概念[J].欧洲,1997(1).